

基督新教在香港

基督教研究中心 專題研討

鄭廣傑大主教（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）

基督新教在香港的歷史，可以追溯至1842年。屈指一算，基督教在香港已發展了164年。要在這裡闡述百多年間香港教會的發展，並不容易。由於香港教會的歷史跟香港的歷史發展不可分割，所以我嘗試以1842、1949及1997三個重要的歷史年份，來貫穿香港基督新教的歷史發展。同時，作為香港聖公會的領袖，我對聖公會的情況較為熟悉，所以也會以本宗的例子，來對比香港教會的情況。

為何我會選這三個年份呢？因為它都標誌著香港史以至教會史的關鍵時代。1842年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，但這個殖民地卻一直跟南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，兩地人民自由進出。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兩地政府始強化邊境管理，1949年後，香港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。不過，在普世殖民地歷史中，香港跟其他殖民地又有很不同的結局——回歸祖國。1997年後，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領土，但卻在「一國兩制」這前所未有的偉大構想下，成為



社會主義制度下的「特別行政區」。從1842至現在，從殖民地到特區，香港的故事，總是跟中國的故事糾纏不清的。

一八四二：開荒與奠基

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，與上述的「中國」因素不可分割。1807年，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）遠渡重洋來到廣州，揭開了近代歐美來華傳教運動的序幕。鴉片戰爭後，清政府被逼打開國門，割讓香港島予英國。香港島既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，英國佔領時人口也不過5000多人，英國選擇香港，完全是為了配合進入中國的政策。1842年改寫了香港的歷史，新安縣邊陲一隅自此變成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前哨站。

如果香港這殖民地的存在是為了「中國」的話，那麼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，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擺脫這種「進入中國」的氛圍。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派，分別是倫敦會、公理會（兩宗後來合併成中華基督教會）、巴冕會（禮賢會）、浸信會、聖公會、巴色會（崇基會）及循道會，史稱「七大公會」。這七個差會都是進入中國傳教的大前提下，先後在本港開基創會。香港是歐美差會進入中國或華南地區傳教的踏腳石及後勤基地，並逐漸發展成為差會華南教區下的一個基地（station）。香港「七大公會」的歷史，跟所屬宗派華南教區的發展，可謂息息相關。有研究香港基督教史的學者指出，從1842年至1949年間，我們必須從「華南

中心成立典禮

暨

基督宗教在香港

Ceremony of The Centre for Christian Studies and
Lecture on "Christianity in Hong Kong"

5.12.2006

教區」的視野及脈絡來認識基督教在香港地區的發展。在廣大的「中國」禾場面前，各差會投放在香港的宣教資源，遠比華南其他地區遜色。

以聖公會為例。在香港開埠初期，史丹頓牧師（Vincent J. Stanton）以首任殖民地牧師（Colonial Chaplain）的身份來港，籌建聖約翰座堂。1849年，維多利亞教區（Diocese of Victoria）成立，施美夫牧師（George Smith）成為教區首任會督。當時，維多利亞教區的範圍包括整個香港及日本，而教區主教座堂則設於香港。1850年，聖保羅書院成立，以訓練華人傳道到中國傳教為目標，今天在中環鐵崗的會督府外牆，我們仍可看見「聖保羅書院」的石碑。不過，1860年代前，香港只是差會進入中國的踏腳石，教會主要牧養的對象，亦是在港的英國僑民。聖公會第一所在港的華人教會——聖士提反堂，要到1865年才落成。換言之，聖公會針對本港的華人傳福音工作，要到1860年代中葉才開展。1890年後，聖公會開始在九龍半島開展工作，成為後來的聖三一堂及諸聖堂。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，聖公會也嘗試在新界開展事工。1906年9月，霍約瑟（Joseph Charles Hoare）會督帶領聖保羅書院4位神學生到屯門青山一帶佈道，在海上遇上颶風喪命，霍會督及4位神學生的屍首也無法尋獲。這次香港歷史上最具有破壞力的「丙午風災」，全港死亡人數多達萬人，也見證了昔日

教會前賢為傳福音而擺上自己生命的一段感人插曲。

隨著英國及美國聖公會在國內傳教工作的發展，以及後來演變為中華聖公會，國內各地先後成立教區。維多利亞教區的轄區亦多次重劃，到1947年，轄區為香港、廣東及廣西南部，又稱為華南教區或粵港教區。

進入二十世紀，五旬節會、神召會、復臨安息日會等差會在往中國傳教的同時，亦在港開展事工。同時，自立的訴求也影響了本港教會的發展。最早的華人自立教會——道濟會堂早於1886年便成立。後來更多教會也不同程度的實現了自立自理。此外，香港基督徒對本地事務亦有關注，例如：1911年有信徒發起成立「海面傳道會」，關心備受歧視的漁民社群。20至30年代的「反對蓄婢運動」，也得到了本港教牧及信徒積極支持。

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佔領香港，開始了3年零8個月的淪陷歲月。期間英美傳教士被捕至集中營，許多教堂被佔，但仍有一些堂會在港與信徒共渡時艱，在困難之中共同仰望上主。據學者估計，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，本地基督徒的人數，大約不會超過1萬人。以當時163萬人口計算，基督徒佔人口比例僅0.6%而已。

一九四九：變局與委身

1949年10月，新中國成立，改寫了中國

的歷史。這年亦是香港基督教歷史發展的分水嶺。

50年代，政局變化為在華傳教運動劃上句號。原來隸屬於華南教區的香港教會，與國內教會的關係也無法維持，「香港教會」因而從華南教區獨立。1949年是史丹頓牧師在香港成立教區的百年紀念，但聖公會港澳教區自1951年起卻與華南教區脫離關係，在沒有隸屬任何教省的情況下，獨立發展。與此同時，許多原來並沒有在香港開展事工的差會及傳教士，也從大陸撤至香港。當他們目睹大量中國難民滯港，決定在此開展新的事工，延續其對華人宣教的使命。例如路德會、宣道會、信義會、循理會、衛理公會等等，都是50年代才在港開基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香港教會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多元宗派局面。迄今香港宗派數目之多，在普世教會歷史上，亦屬罕見。

50年代是香港教會的增長及躍進時代。有傳教士統計，1955年香港共有188所堂會，信徒5.3萬人。3年後，調查指教會增至294所，信徒人數為7.4萬人，信徒的增長率為38.6%。到1962年，教會數目為344所，信徒更突破10萬大關，多達11.2萬。與1955年相比，信徒增加了111.7%，平均每年有15.9%的增長率。以62年本港352萬人口計算，基督徒佔總人口的3.18%。50年代基督教在香港的增長，絕對是空前絕後。

毋庸置疑，「中國」因素對戰後香港教會的增長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除了大量宣教資源撤至香港外，49年後，超過100萬的難民湧入，激化了本地社會的種種問題。由於基督教能夠迅速回應本地社會的各種需要，不僅促成了香港教會史上的增長與躍進，更大大紓解了香港社會的危機。香港基督教在香港的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建立的深厚基礎，便是在50至60年代奠定的。

70年代以後，基督教進一步參與本地社會服務，特別在教育及福利服務上，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密切的「伙伴」關係。70年代末，全港

40%的學校由基督新教及天主教會興辦，在教會學校就讀學生佔全港學生人數44%，基督教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實體。同時，教會亦緊隨政府發展新市鎮的步伐，積極投入植堂工作。不過，由於信徒增長未能追上人口增幅，增長率呈現放緩的趨勢。

香港聖公會在何明華會督（Bishop R. Hall）的帶領下，在50年代除了積極拓展傳福音工作，建立了多所堂會外，亦回應本港社會需要，參與福利救濟、房屋及教育工作。到1974年港澳教區成立125週年紀念時，聖公會堂會數目已增至28所，並辦有46所小學、23所中學及14個社會福利單位。

在80年代以後，西差會及西方傳教士逐漸退出香港。香港教會各宗派基本上由華人負責領導工作，實現了自養及自治的目標。蒙上主選召及教會眾弟兄姊妹的支持，本人於1981年被選任為聖公會港澳教區第一位華人主教，也是聖公會本地化的一個象徵。此外，不少以特定群體作事奉對象的福音機構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，與教會彼此配搭，實踐福音使命。

一九九七：挑戰與反思

1997年7月1日，英國結束在香港155年的統治，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。香港歷史開始脫離殖民地時代的「借來的時間，借來的空間」，朝向港人治港的方向邁進。

80年代初，香港社會因中英會談而產生對前途的憂慮。當時，香港教會對「九七」的最大困擾，是原有的宗教自由能否維持，以及中央會否限制基督教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參與，藉此削減教會在公共領域的影響。1984年香港教會領袖發表了「香港基督教有關宗教自由的聲明」、訪北京團「對香港前途意見書」及「信念書」等，積極回應了香港在政治變化中的各種衝擊。本人亦獲邀請參與了《基本法》的起草工作，積極反映港人及信徒的關注。

針對港人的憂慮，中央政府提出了「一國

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、50年不變」的承諾，並且在《基本法》中重申維持原有的制度。《基本法》第141條「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」，「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、其他學校、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」的條款，正是回應宗教界人士的關注。

回歸的挑戰亦激發了香港教會及信徒對中國的關愛。許多宗派、堂會、機構均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中國的事工。香港基督教對中國的承擔，在普世華人教會中，肯定佔有極其重要的角色。

1999年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公佈其對香港基督教會之普查結果，揭示出香港教會在堂會數目增加的同時，信徒人數下滑的「負增長」警號。此外，香港基督教一直賴以自豪的教育及福利服務提供者的角色，又因為特區政府的政策調整而面對挑戰。隨著政府在社會服務及教育方面推行的改革，以及改變資助的方式，教會必須認真反思自己的角色與定位。同時，面對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的發展，我們也得探討今後香港教會如何在「互不隸屬，互相尊重，互不干涉」的三互原則下，建立關係。

1998年，聖公會香港教省成立，本會的歷史進入新的階段。今天，聖公會在港澳的堂會已有50所，33所中學及65所小學。1973年成立的聖公會社會福利協會，亦全力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工作。2009年是聖公會在港開基160年的大日子，我們需要反省及檢討教省在福傳、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，作為我們迎向160年紀念的預備。

轉眼間，就是馬禮遜牧師（Robert Morrison）來華200年的重要日子。2007也是基督教在港開基165年的紀念。我們該如何總結基督教在香港的工作？現時，每主日平均有22萬人參與崇拜，佔本港699萬人口的3.14%，全港各地約有1200所大小堂會。教育方面，基督教團體開辦了逾630所學校（包括273所幼稚園、206所小學、160所中學）和116所幼兒園。社

會服務方面，基督教團體營辦7所醫院、18個診所和60間社會服務機構。這些社會服務機構在各區提供多種社會服務，計有社區（家庭及青少年）服務中心逾250所、日間護理中心75所、兒童院17所、安老院35所、老人中心逾100所、弱智和殘疾人士訓練學校47所和戒毒康服中心25所。面對上述的數字，我們是否自滿？在感謝上主160年來的保守及帶領之餘，我們必須不斷反思教會的角色及使命。

時代處境的轉變，要求我們能夠與時俱進。昔日教會的發展模式，曾有的貢獻，並不必然地代表今後仍具效用。香港基督教擁有獨殊的歷史背景，除了日本人佔領香港的3年零8個月外，我們沒有經歷戰亂，在普世華人教會發展中，享受了不同的機遇，積累了許多的資源。我們該如何拓展上帝的國度？如果我們仍然沉醉於昔日的光輝歲月，而沒有作全面的反省，當外在環境進一步改變時，就會好像五個愚拙的童女般，在大門關上時才赫然醒覺，便為時已晚了。

在聖約翰座堂內的聖米迦勒堂（St. Michael's Chapel），有一個小祭壇。這個簡單的祭壇來自香港淪陷時期深水埗集中營內的小教堂。它是由囚犯用盒蓋及從垃圾堆中找到的銅十字架所製成。上面刻有Richard of Chichester的禱文：「感謝我的主耶穌基督，賜福給我並為我承受痛苦及侮辱。最滿有慈愛之救贖主，友人及弟兄，讓我更清楚你，更親切的愛你，更貼近地跟隨你，天天如是，阿們」。在最艱難的日子中，在沒有盼望的黑暗中，上主成為了香港信徒的盼望、勇氣、安慰與力量。那時，許多宏偉的禮拜堂被日軍佔用、信徒因戰亂流離失所、教會也無法興辦學校及其他社會服務工作，基督信仰被退守成為信徒與上主間個人的關係。但是，因著信徒的堅守，寶貝得以藏在瓦器裡（林後4:7）。今天，我們同樣需要從上而來的智慧，使香港眾教會不忘從天上來的異象，把我們所存承的「寶貝」拿出來，為這城市守望，並為主作更美好的見證。